

# 对《非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批判

張 培 剛

当偉大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一十年后，在資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反动的《非共产主义者宣言》。历史已經証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犹如东升的旭日，更是指路的明灯，照耀着全人类、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前途。历史也将証明，《非共产主义者宣言》的出版，只不过是沒落阶级垂亡时的哀吟，表現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穷途末路上的掙扎、徬徨和空虚。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謀士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于1958年和1960年先后在英国发表和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sup>①</sup>罗斯托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馬薩諸塞理工学院当过教授；在肯尼迪政府中被任命为負責国家安全事务的付特别助理；近又被提升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計劃委员会主席，鼓吹推行軍事詭詐政策，成为肯尼迪破坏和鎮压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策划顛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得力帮凶。

罗斯托的这个“宣言”，是世界資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新阶段后一个狂妄淺薄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动宣言。罗斯托以《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作为本書的副标题，亦足見其用心何在。他在書中厚顏无耻地宣称，他的关于“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論”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要代替馬克思主义对現代历史的解釋”。他的这种狂言謬語，当然投中了垄断資本家的心意，所以这个“宣言”一出，虽然在资产阶级經济学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但却得到垄断資本集团的一致賞識，把它譯成許多文字，为之吹嘘捧場。比如英国垄断資本集团的喉舌《經济学家》杂志，在发表該書摘要时，就把这个毫无科学气味的著作捧成是“战争（資本主义世界）在經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鼓舞的貢獻之一”；美国《生活》杂志在1960年4月11日还专文加以介紹，并說这本书“在經济学界引起那样大的爭論，是凱恩斯发表他的名著（指《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引者）以来所沒有見过的”。

本文在于对这个反动的《非共产主义者宣言》，进行初步的分析批判。

## （一）《非共产主义者宣言》反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否定資本家的利潤動机，企圖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

《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的作者罗斯托，在第一章“緒論”中就大言不

\* 本文是作者在武大講授政治經济学專題講稿的一部分。

①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1960年英国劍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譯本1962年商务印書館出版。（中譯本副标题为“非共产党宣言”。）在1958年，罗斯托曾以“經济史学家对現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为题，在英国劍桥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講；1959年8月15日和22日曾用提綱形式將講稿摘要发表于英国《經济学家》杂志；1960年才改用現在的書名出版。讀者可參閱李宗正《簡評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文，載中譯本序头，第1—7頁。

漸地吹噓“成長階段論的目的”就是要“代替馬克思關於現代歷史的學說”；接着他說將在最後一章（即第十章）中對他的觀察事物的方法和馬克思的觀察事物的方法加以比較。<sup>①</sup>在第十章“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成長階段論”中，羅斯托指出他的分析和馬克思的分析的“第一個和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對人類動機的看法。”<sup>②</sup>現在我們就從這個“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出發，看看羅斯托的中心論據——“對人類動機的看法”究竟是什麼貨色。

羅斯托首先從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的根本觀點，也就是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羅斯托說：“雖然成長階段論是一種從經濟方面觀察整個社會的方法，但是它絕不意味著，政治、社會組織和文化等方面只是以經濟為基礎而且只是從經濟中派生出來的上層建築。相反，……雖然經濟的變化造成了政治和社會後果，但是本書却認為經濟變化本身是政治與社會以及狹義的經濟力量所引起的後果。我們認為，根據人類的動機來說，許多最深刻的經濟變化是人類非經濟動機和願望所造成的後果。人類動機是經濟成長的基礎。”<sup>③</sup>

這裡，羅斯托否認“政治、社會組織和文化等方面只是以經濟為基礎或從經濟中派生出來的上層建築”；而主張人類動機是經濟成長的基礎，認為“許多最深刻的經濟變化是人類非經濟動機和願望所造成的後果”。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羅斯托還用極其惡毒無賴的手法，在上述一段文字中說他“從一開始起就接受了馬克思在最後承認，而恩格斯在晚年才願意衷心承認的看法，即社會是互為作用的有機體。”<sup>④</sup>按照羅斯托的這種說法；似乎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到了晚年才把社會看作是“互為作用的有機體”，似乎他這個羅斯托的上述看法倒是“承襲”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看法”而來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觀的最無恥的歪曲的輕蔑。

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實的人都可以認識到，儘管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已經在批判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生活的早期，就反對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反對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待世界，去觀察社會的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明確而透徹地闡明了的，“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認為：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着和互相影響着。……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sup>⑤</sup>可見羅斯托硬說馬克思、恩格斯“直到晚年才承認社會是互為作用的有機體”，這除了蓄意中傷外，是找不到任何事實根據的。但問題還不僅限於此。全部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如何看待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

① 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者宣言》，中譯本，1982年商務印書館版，第8頁。

② 同上書，中譯本，第168頁。

③ 同上書，中譯本，第8—9頁。

④ 同上書，中譯本，第8頁。

⑤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67—768頁。

意識，抑是相反。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偉大基本問題，就是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sup>①</sup>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觀和罗斯托之流的唯心史觀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5—46 年，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就指出“不是意識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識。”<sup>②</sup> 1859 年，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概括而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經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sup>③</sup> 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个偉大的理論，可說是在人类認識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正如列宁所說的，“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們过去对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見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論所代替。”<sup>④</sup>

而罗斯托之流則认为人們的意識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类动机是經济成长的基础”。这种历史觀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觀根本对立的。这种历史觀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性，否认物質資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否认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一句話，这种历史觀否认“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样的历史觀，說：“过去的一切历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作是历史过程沒有任何联系的附帶因素。……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間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偉績，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論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贊同这一时代的幻想。”<sup>⑤</sup> 这个批判，对于今天的罗斯托的观点，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包括罗斯托在內的当代壟断资产阶级辯护士以及現代修正主义者，还故意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觀，把它曲解为“唯經济决定論”或“唯生产力論”，似乎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經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經济变化对政治变化、意識形态变化的决定作用，而沒有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經济基础的反作用。比如罗斯托在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觀时，又“得出了这个結論：社会的行为不单决定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 366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 頁。

③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3 頁。

④ 列宁：《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 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 頁。

于经济考虑”；<sup>①</sup> 好象马克思曾经主张过社会的任何行为只是“单单决定于经济考虑”似的。这当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和“修正”。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屡次加以批判过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接着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作了最充分的阐明，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sup>②</sup> 这样的看法，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罗斯托在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观点之后，接着竟要无赖地说他“从一开始起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并在最后一章中专设一节大谈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的成长阶段论的“相似之处”。这种手法，倒是和新修正主义者颇有相同之点。所不同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就把自己从资产阶级那里贩运来的货色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而罗斯托之流在歪曲马克思主义之后，则把自己的资产阶级货色说成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如此而已。

罗斯托在提出了“人类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的根本观点之后，进一步歪曲和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分析，否认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的根本动机。他说：“马克思的体系，正如古典经济学一样，是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大体上可以推广而包括经济利益）的观念中得出的一套多少经过一点修饰的逻辑推论。”<sup>③</sup> 他反对《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本主义“除了赤裸裸的个人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sup>④</sup> 在他的成长阶段论中，“人被看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个体。他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追求权力、安闲、事业、经验和安全的继续；他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所熟悉的他的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所珍视的信心，也关心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sup>⑤</sup> 关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罗斯托解释说：“在日本，对现代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高额利润和工业消费品的示范作用”；<sup>⑥</sup> “在内战后的美国，人们为了使一个富饶的大陆工业化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也因为在在一个教会和国家都居于比较不重要地位的社会中，权力、事业、任务和社会威望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sup>⑦</sup> 在论述美国之后，接着他又说：“如果要正确地解释德国、日本、瑞典、法国、美国以及的确还有俄国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就必须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动机的看法也作同样的修改。”<sup>⑧</sup> 这种论点是完全错误、也是极为荒谬的。

第一，上面已经论述过，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认为“物质生活

①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69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92页。

③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⑤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68页。

⑥ 同上书，中译本，第35页。

⑦ 同上书，中译本，第172—173页。

⑧ 同上书，中译本，第173页。

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就如何。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来不否认包括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积极影响作用，而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一向就是同历史唯心主义的那种以“人们的观念”或“人类的动机和愿望”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进行着毫不调和的斗争。现在罗斯托之流，竟说什么“马克思的体系是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观念中得出的一套多少经过一点修饰的逻辑推论”，似乎马克思的体系只是从资本家作为“人”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观念”中得出的主观论断，只是把古典经济学“多少加一点修饰的逻辑推论”，而不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后创造性地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这当然是最大的歪曲和诬蔑。

第二，罗斯托反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只是“赤裸裸的个人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否认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起决定作用的是高额利润”，否认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资本家是“为了赚钱”。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开和最深刻的论证。但是，即使在《共产党宣言》中象罗斯托所引用的那一句，也已经指出了，而且第一次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罗斯托不是也恰好露了马脚，说“在内战后的美国，人们……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也因为……权力、事业、任务和社会威望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吗？所谓“权力、事业、任务和社会威望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不正是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以“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为基础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更加充分而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根据马克思的科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以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增殖，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①</sup>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将近结尾时又概括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特征：“第一，它把它的生产物当作商品来生产。……可以特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标记的第二点，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作生产的直接的目的和决定的动机。”<sup>②</sup>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罗斯托否认日本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它的兴起时期或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是为了“高额利润”和“赚钱”，否认剩余价值及其特定形式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这当然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但是资本主义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其直接目的和绝对规律这一点，却是罗斯托的主观愿望所否定不了的。

第三，罗斯托否认资本家的根本动机是追求经济利益，追求高额利润，说什么“人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个体，他不仅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为了赚钱，而且还追求权力、安闲、事业、社会威望等等”，甚至“也关心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确实，象罗斯托之流还关心“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52—1154页。

何更得到肯尼迪政府的高官厚禄”，关心“破坏和镇压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关心“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試問：資本家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根本动机是什么？他的这种动机又是什么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回答，标志着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根本分歧。当代资产阶级辩护士們（包括罗斯托之流）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們，总是抽象地来看人，脱离社会性、阶级性来看人，一般地談論什么“人性”，“人道主义”等等。按照这种观点，作为垄断資本家的“煤油大王”洛克斐勒可以“发善心”，作为帝国主义头子的肯尼迪也可以“表現明智”。馬克思主义者則认为，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人們的意識和动机。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的，“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简单些說，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和人們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sup>①</sup>因此，必須从人們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来观察人們的意識和动机。根据这种唯一正确的观点，資本家只不过是“人格化的資本”而已，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不断地追求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罗斯托为了否认追求利潤是資本家的根本动机，曾劝告人們絕不要忘記凱恩斯的名言：“如果人的天性不喜欢碰运气，或对建設工厂、铁路、或开矿本身（即除了利潤以外）不感乐趣，那么純粹由于冷静盘算而进行的投資就不会有很多的。”<sup>②</sup>但是我們要問罗斯托和那些凱恩斯分子們：如果开矿、修铁路、開設工厂不能提供必要的利潤，資本家会去投資嗎？他会不顧亏本而只因喜欢皮鞋而投資開設皮鞋工厂嗎？資本家在交易所投机碰运气，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又是为了什么呢？罗斯托为了不同意資本家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賺錢”，还故意地問：“我們如何解釋，人們在已經有了超过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子女所能使用的金錢很久以后，为什么还努力奋斗？”<sup>③</sup>这里，我們不妨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引用过的一位作者对資本家的活动的生动描写来“奉告”罗斯托：“一有适当的利潤，資本就会胆壮起来。10%的利潤会保障資本在任何地方被使用；……100%会使人不顧一切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sup>④</sup>我們看，資本家为了賺錢，为了追求高額利潤，利欲熏心，連絞首的危險也在所不顧，难道在“超过他們自己或他們子女能使用的金錢”以后，他們就能“洗手不干”嗎？并且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发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的資本自行增殖，那就是尽可能大的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是資本家的尽可能大的对于劳动力的榨取。”<sup>⑤</sup>試問罗斯托之流的辩护士們：难道你們的垄断資本集团、你們的資本家不是这样不絕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尽可能多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嗎？有哪些資本家在“超过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子女所能使用的金錢”以后，他們又“洗手不干”了呢？如果資本家不是損人利己，不是貪得无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高額利潤，那也就不成为資本家了。

罗斯托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觀點，不願羞恥地噤叫：“必須对馬克思关于人类动机的片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8頁。

② 罗斯托，前引書，中譯本，第9頁；所引凱恩斯的話，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譯本，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128頁。

③ 罗斯托，前引書，中譯本，第173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1頁，附注250。

⑤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3頁。

法”进行“修改”。但事实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放之四海、放之任何国家和任何社会形态也都准确的历史观。历史証明：倒不是要对馬克思关于人类动机的看法作任何“修改”，而是要把罗斯托之流企图掩盖資本主义剝削实質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根拔掉，全部拋棄！

## (二)《非共產主義者宣言》抹杀社会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企圖以“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代替馬克思主義關於社会發展的科学分期

罗斯托在書的开头就大言不慚地吹嘘他“提出了一个經濟史家归納現代史的发展的方法”，即“把現代史分为一系列的成長阶段”的方法。<sup>①</sup>他不自量力地企圖以他的这种“經濟成長阶段的理論”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对現代历史的解釋。他为了同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發展史的科学分期对立，把世界各国的經濟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或五个历史时期：<sup>②</sup>

1. 傳統社会。“傳統社会是这样一個社会，它的结构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牛頓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頓以前的对物質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在这里，牛頓是被当作历史的分水岭的标志。”“由于生产力受到限制，这些社会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农业。”

2. 为发动創造前提条件阶段，或正在过渡中的社会。这就是“发动的前提条件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現代科学的洞察力开始变成农业和工业的新的生产作用。

3. 发动阶段。“发动阶段是妨碍不断成長的旧的障碍物和阻力最后已被克服的时期。促进經濟进步、引起現代活动的有限的时隱时現的力量扩大起来，并且成为控制社会的力量。成長成为社会的正常情况。”“在发动阶段中，有效投資和儲蓄可能大致从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

4. 向成熟推进阶段。“成熟阶段是經濟表现出有超出原有的、推动它的发动的各种工业之外的能力和吸取現代（当时）技术的最先进的成果并且把这些成果有效率地应用于自己很多种——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资源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民收入大概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經常作投資之用，这就使生产的增加能夠經常超过人口的增加。”

5. 高額羣众消費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主导部門轉移到耐用消費品和服务业方面”；“社会不再认为进一步推广現代技术是一个比一切都重要的目标”；“福利国家的出現是一个社会超越技术成熟时期的一种表現。”

这里，罗斯托提出了五个不同的“經濟成長阶段”或“社会历史时期”。根据这种所謂“成長阶段論”，罗斯托把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列为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就已先后进入“高額羣众消費阶段”的国家，把西欧的瑞典、西德、法国和日本列为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正在达到“高額羣众消費阶段”的国家；把苏联說成是尚处于“成熟阶段”的国家；而把我国同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墨西哥等同起来，一概列为处于“发动阶段”的国家。<sup>③</sup>这真是不分青紅皂白，把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完全加

① 罗斯托：《經濟成長的阶段：非共產主義者宣言》，中譯本，第7頁。

② 关于說明这五个阶段的摘要引語，均見罗斯托，上引書，第二章，《五个成長阶段——綜論》，中譯本，第10—18頁。

③ 同上書，中譯本，第6頁，參閱《若干国家經濟成長阶段图》。

以混淆了。这种論調是非常肤淺的，但手法却是极其恶劣的。

首先，我們要看看罗斯托所据以划分这些阶段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东西。罗斯托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并没有一个統一的标准。他有时以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时以生产发展水平，有时又以消費水平作为分期标准。他完全撇开了各个社会的經济基础，而把个别历史人物，如把牛頓当作是区分傳統社会和以后各阶段的“历史的分水岭的标志”，說什麼傳統社会不仅是“以牛頓以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是“以牛頓以前的对物質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他所說的生产发展水平，也只是在生产上吸取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程度，具体表现为投資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发动阶段这个比重大致为5—10%，在成熟阶段这个比重增到10—20%。他在談到消費水平的时候，又只是以縫紉机、自行車、汽車、冰箱等所謂“耐用消費品”作为标准，而完全抹杀了消費的階級性質以及資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貧困化的真实情况。他甚至宣称：“从历史上說来，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供羣众之用的廉价汽車以及汽車对社会生活和期望所造成的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社会上和經济上的影响。”<sup>①</sup>为了支持他的这个所謂“汽車决定論”，罗斯托还在書末附列了两張表，說明美、英、法、加拿大等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从1900年到1958年私用汽車的普及情况。<sup>②</sup>按照他的这种說法，“高額羣众消費时代”也就是“汽車和冰箱的时代”或“購物分期付款的时代。”

罗斯托关于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和論点，是极端荒謬的。試問：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那么一个社会和另一个社会的性質又有何根本区别呢？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階級社会是階級斗争的历史。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和階級关系，特别是离开了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資料所有制，就无法区分和判別不同的社会形态，就不能认清一个社会的性質。馬克思指出：“不論生产的社会形态如何，劳动者与生产資料总是生产的因素。……为了要有所生产，它們必須互相結合。这种結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区别着社会結構的各种不同的經济时代。”<sup>③</sup>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科学的发现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他的著名的《馬克思墓前演說》中就說过，“科学在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sup>④</sup>但是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把个别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成就，甚至他的宇宙观（即罗斯托所說的科学家“对物質世界的态度”），当作划分社会形态、区分不同社会的性質的标准。因为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正是罗斯托的观点。馬克思早就批判过这种观点，写道：“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依据。恰恰相反，这个意識正須从物質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釋。”<sup>⑤</sup>至于罗斯托拿汽車、冰箱之类的“耐用消費品”的生产和消費，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并以之作为“高額羣众消費时代”的主要特征，还吹嘘这是“福利

① 罗斯托：《經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譯本，第17頁。

② 同上書，中譯本，第189—195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頁。（譯文略有更改）

④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67頁。

⑤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頁。

国家的出现”，那更是荒唐可笑的。马克思早也指出过，“划分经济时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作。”<sup>①</sup> 罗斯托恰恰是用生产和消费什么来划分经济时期，这也就暴露了这位“肯尼迪谋士”该是多么浅薄！表面看来，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花样很多，分期标准也飘浮不定。但实际上，他们说的“传统社会”，就是他不加区别地企图混合起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称；他所说的“发动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时代”，就是他企图加以粉饰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阶段以及垂亡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显然，罗斯托的历史分期法，也有一个为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所共同一致采用的“标准”，那就是根本避而不谈从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的基础，完全否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完全抹杀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而力图用一些偶然的、表面的现象去说明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掩盖阶级社会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矛盾。

其次，罗斯托宣扬他的“成长阶段论”不仅“具有内在的逻辑和连续性”，而且“有一种分析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是以关于生产的动的理论为基础的。”<sup>②</sup>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的这个“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货色。

罗斯托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使自己的辩护论调更富于欺骗性，一方面假装批评“关于生产的正统理论”，说它是“据根基本上是静止的假定而提出的”；另一方面又假装批评现代经济学家，说他们固然“企图把关于生产的正统理论同凯恩斯的收入分析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动的可变因素如人口、技术、企业精神等”，“但是，他们倾向于以非常呆板和笼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工作，因而他们的典型不能夠掌握住经济史家所看到的成长的基本现象。”<sup>③</sup> 接着罗斯托宣称：“我们需要有一种关于生产的动的理论，它不仅把收入在消费、储蓄和投资（以及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之间生产平衡）之间的分配分开，而且直接而又相当详细地集中注意于投资的构成和经济的各具体部门的内部发展情况。”<sup>④</sup> 据他说，这样“把关于生产理论的习惯范围加以扩大，我们就不仅可以说明生产、投资和全部消费在理论上的相对地位，而且也可以说明经济的每一部门的相对地位。”<sup>⑤</sup> 看来，罗斯托想“革新”庸俗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并“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的“雄心”倒是“自命不凡”的。

可惜的是，罗斯托的所谓“革新”和“扩大”，折穿来看，仍然不过是把以马夏尔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同当代凯恩斯学说的某些方面拼凑起来，用以从表面上去解释历史上某些经济现象的变化而已。罗斯托援引了马夏尔的“供求论”，说明各经济部门的最适当的地位，“在需求方面是由收入水平和人口水平以及嗜好的性质决定的；在供应方面，则是由技术情况和企业精神的性质决定的。”<sup>⑥</sup> 他又运用和“扩大”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惯用的“需求弹性”的概念，说什么各经济部门的迅速成长时期“是需求随物价或收入而变的弹性很大所造成的”，又说什么“对保持经济的全面的冲动力起着重要作用”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5页。

②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9页。

③ 同上书，中译本，第19—20页。

④、⑤ 同上书，中译本，第20页。

⑥ 同上书，中译本，第20页。

主导部门的地位，“也是由于对价格和收入表现出很大的弹性的各种需求所决定的。”<sup>①</sup> 这种論調完全抹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撇开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矛盾，而只是从供给和需求所反映的表面现象来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且把个人嗜好和企业精神等心理因素也当作形成经济发展阶段的决定力量。这种“革新”和“扩大”，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正是前面已经批判过了的罗斯托之流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具体表现。罗斯托还应用了凯恩斯关于扩大消费、增加投资的“理论”和政策，形成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荒诞无稽的所谓“汽车决定论”或“耐用消费品决定论”。不仅如此，为了扩大消费，增加投资，罗斯托也和凯恩斯一样，大肆鼓吹战争。凯恩斯曾经荒诞地说：“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能有助于增加财富。”<sup>②</sup> 现在罗斯托在谈到投资的适当形态时，固然说“战争破坏了资本”；但接着就指出：“战争有时也加速了同平时经济有关的新技术的发展，并且改变了政府和社会的组织，使之有助于平时的增长。”<sup>③</sup> 他这样热衷于论证战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好处”，无非是要使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战争而增加投资出路，攫取更大的利润。无怪乎罗斯托被垄断资本集团大为垂青，一跃而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成为肯尼迪推行军事讹诈政策的得力帮凶。

再次，前面说过，罗斯托把人类动机当作是社会存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企图否定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现在，罗斯托就根据他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一个社会（或成长阶段）向另一个社会的过渡和转变。他说，“在傳統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有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对较先进国家的侵略的反应——一向是一种最重要的和最有力的动力，它至少同获得利润的动机一样重要。”<sup>④</sup> 这里，罗斯托实际上是指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按照他的说法，这一过渡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力的动力是所谓“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他所說的，“掌握实际权力或势力的人所以愿意消灭傳統社会，主要地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傳統社会未能或不能保护他们不受外国人的侮辱。”<sup>⑤</sup> 这种論調是十分荒謬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既不是由于掌握实际权力或势力的人的某种意愿，也不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反应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的反映；而解释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原理，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状态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sup>⑥</sup> 而罗斯托的上述謬論，就完全掩盖了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根本原理，抹杀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普遍规律的决定作用。

最后，罗斯托还竭力粉饰帝国主义，企图掩盖和歪曲当前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他

①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22页。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页。

③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21页。

④ 同上书，中译本，第34页。

⑤ 同上书，中译本，第34页。

⑥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35页。

說：“如果說二十世紀的重大的力量斗争有其在经济上的基础的话，这个经济上的基础并不在于帝国主义，也不在于所谓资本主义垄断阶级所引起的强制，甚至也不在于极少数几个国家对殖民地的自发的竞争。经济上的基础在于欧亚大陆力量斗争舞台的形势，这是相对的成长阶段和军事潜力所决定的。”<sup>①</sup>他又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某个时候，斗争的情况在性質上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式武器，特别是氢彈的制成；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成长过程的总的影響。”<sup>②</sup>这里，罗斯托完全回避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回避了在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并公开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辯护；企图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人民的剝削和压迫、在国际上挑起战争和制造紧张局势开脫責任。他歪曲当前国际斗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说什么这个“经济上的基础在于欧亚大陆力量斗争舞台的形势，而这又是由相对的成长阶段所决定的。”那就是說，这又是由于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消费水平”不同、“工业发达程度”不同、“科学技术水平”不同所决定的。罗斯托还以“军事潜力”来掩盖阶级矛盾，掩盖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说什么“由于新式武器，特别是氢彈的制成”使当前国际斗争“在性質上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罗斯托这样胡說八道，掩盖阶级矛盾和否定阶级斗争，原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自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講到国际形势时，也只是大談其“消费水平高的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資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貧困地区之間的矛盾”等等，却偏偏沒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沒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他們把“在国际和一切范围内”的矛盾，說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貧困地区的矛盾。”他們和鉄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說成是什么“两大軍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他們还和鉄托一样，都认为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战争的性質”，“改变了我們所处时代的特征”，要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要用“和平共处”代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試問，这些人的論調和罗斯托之流的論調，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論”完全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故意抹杀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不仅如此，罗斯托一方面极力粉飾帝国主义，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剝削实質；另一方面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无耻地把苏联列入所謂“成熟阶段”，說它比美国、西欧、加拿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落后”；把中国同印度、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列为同一类型，說都是处于所謂“发动阶段”的国家。他恶毒地輕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吸引中国知識分子走向共产主义的不是馬克思主义，也不是苏联的经济成就，而是“列宁用以統一和控制一个广大而非常分裂的国家的組織艺术。”<sup>③</sup>他更荒謬地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病症”，说什么“共产主义是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和凱末尔的土耳其之外的一种特殊不合人情的政治組織形式。”<sup>④</sup>这些，当然是不值一駁的胡言濫調。但从这里我們也可

①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譯本，第138頁。

② 同上書，中譯本，第139頁。

③ 同上書，中譯本，第184頁。

④ 同上書，中譯本，第185頁。

以看出罗斯托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忠诚奴僕和肯尼迪政府的得力幫凶的本来面目了。

(三) 《非共产主义者宣言》妄想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会發展規律的學說，為窮途末路的資本帝國主義獻計謀策

罗斯托妄图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关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規律，一味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辯护，竭力为他的“高額羣众消費时代”吹嘘，大事鼓吹所謂“和平的世界大家庭”的騙人口号。但是罗斯托在这里也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色厉內荏的本性，当他提出了“下一阶段是怎样一个阶段”、“社会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的問題时，也不免黯然神伤，内心空虚。

罗斯托首先攻击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學說。他提問：“资本主义由于有一种所謂利潤下降的內在趨勢，它是不是会使垄断发展、危机越来越严重和引起国际間爭奪市場的殊死战斗呢？”<sup>①</sup>他企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否定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第一，关于“工业集中”的問題，罗斯托說，“至少美国的情形沒有說明在例如过去五十年中，集中的程度有很大的增长。”<sup>②</sup>这当然是完全歪曲事实的謊言。我們知道，自由竞争引起生产积聚，生产积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垄断，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趨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生产积聚发展到相当程度，可以說，就自然而然地直接走向垄断。”<sup>③</sup>就美国而論，过去五十年正是生产积聚、資本集中、垄断統治越来越加剧的时期。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及战后阶段來說，这种趨勢就非常明显。根据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低估了的統計，从1940年到1947年被大工业公司吞并的加工工业公司和采矿业公司就不下2,450家，后者的資產共为52亿美元，占工业公司1943年資產总额的5.5%。<sup>④</sup>在战后初期阶段，合并的过程更为迅速。国家在战时委托或租給大垄断組織經營的工厂，在战后以廉价标賣方法轉入大垄断組織之手，这就不仅使垄断組織大发橫財，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工业中的資本集中。例如单单石油工业的垄断組織就从国家手里購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炼油厂。根据同一統計来源，从1948年到1954年，在美国由于合并和吞并，又消除了早先“独立的”公司1,610家。可見，事实俱在，罗斯托想否认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資本集中进一步加剧的趨勢，也完全是徒劳的。

第二，关于“危机日益严重”的問題，罗斯托大事鼓吹凱恩斯所主張的“革命”，說什么“凱恩斯已規定了击败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趨勢的預測的任务，并已獲得了很大的胜利。”<sup>⑤</sup>这也只是自欺欺人之談。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进一步采行了凱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开支，实行通貨膨脹，扩軍备战，加强国民經济軍事化等，但是这不仅沒有消除危机和失业，而且战后經济危机愈来愈頻

①、② 罗斯托：《經濟成長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譯本，第174頁。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頁。

④ 統計数字引自魯賓斯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垄断資本》，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82頁。根据另外一种資料計算，这一期間被吞并的公司有6,500家，約占工业公司总数的7%。見同書同頁，附注2。

⑤ 罗斯托：《經濟成長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譯本，第175頁。

繁，失业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只好哀叹凯恩斯的“灵丹妙药”并不奏效了。比如美国的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哈雷·约翰逊，在纪念凯恩斯发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二十五周年的一文中，就不得不承认说，凯恩斯的“作为乘数依据的消费倾向在预测战后失业的试验中已遭到可怕的失败。”<sup>①</sup>

第三，关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依赖”问题，罗斯托说什么“当殖民主义实际上几乎已经死亡的时候”，“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是由于对帝国主义（指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引者）的依赖”；还吹嘘“国内需求太大，因而政府不能拨出足够的资源供国外事务之用”，“不愿意充分关心不发达国家的世界。”<sup>②</sup>这又是为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进行辩护的老调新弹。我们知道，“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在那里，资本主义的规律就会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sup>③</sup>当然，说“帝国主义愿意关心不发达国家的进步和幸福”，那只是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欺骗人民的宣传口号；但是帝国主义总是关心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规律。罗斯托企图否定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掩盖战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在全世界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事实，那是枉费心机的。值得注意的是，罗斯托说“殖民主义实际上几乎已经死亡”，而有些人也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实际上同样掩盖帝国主义者同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起了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作用。

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罗斯托当然不愿意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胜利的科学结论。可是他大事宣扬的“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以及下一阶段又将是怎样的呢？

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绝对还没有到达终点，就是在美国也是这样；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和日本，高额群众消费时代正在越来越有力量。”他又说，“由于复利增长规律的作用和最广泛意义的需求因收入而变的弹性在不同社会中表现出来，将有各种不同的消费状态。”<sup>④</sup>这里，罗斯托又大肆贩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需求弹性”的论调。然则，各个不同的社会或国家究竟将有哪些不同的“消费形态”呢？罗斯托说：“其他社会对汽车工业的投资无需象美国那样多”，“也无需象美国那样，建筑新的大陆和大城市公路网，以及修造汽车停车场”，等等。说来说去，也还是汽车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的花样形式、使用存放问题。显然，他完全抹杀了消费的阶级性质和产品的分配关系。罗斯托在吹嘘了“高额群众消费时代”衣、食、住、行非常充足美好之后，接着提出：“社会将要发生什么变化呢？”“下一阶段又将是怎样一个阶段呢？”这里他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回答和具体的方案。看来，作为“肯尼迪谋士”的罗斯托也空虚彷徨，心中无数。他最后只好聊以解嘲地

① 哈雷·约翰逊：《凯恩斯〈通论〉发表二十五周年》，《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5月号。

②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76页。

③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红旗》1963年第3—4期合刊，第12页。

④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译本，第104—105页。据罗斯托的解释，“复利增长规律这一名词是一简称，用来说明成长通常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很象一种利息和本金一并计算生息的储蓄账户。”见同书，第8页，附注2。

說：“我們无需在这个問題上用太多的脑筋。”①

但是罗斯托却明显地感到帝国主义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他說：“就目前來說，就这一代或許还有下一代來說，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两只很大的拦路虎。首先是现代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存在，如果对这些武器不加控制和监督，它們能够一下子永远地解决人类的一切問題。其次是整个南半球以及中国，正积极地处在为发动阶段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或发动阶段的事实。”②罗斯托的这一段話，暴露了当代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之流的心事：

他們固然害怕核武器，但更害怕“整个南半球以及中国”，这就是說，更害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害怕这些国家的独立、兴盛和强大。所以罗斯托黯然神伤地說，“军备竞赛和新兴国家这两个問題，对于在技术上比較成熟的北半球各国（应讀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引者）來說，是最令人伤脑筋的問題。”③在这种前景下，罗斯托也感到他的“高额羣众消费时代”的广告牌号无能为力，他說：“我們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述两个問題上，而不管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甚至扩大家庭，是如何动人。”④从罗斯托的話里，我們可以看出，南半球的“新兴国家”竟然成为北半球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最伤脑筋的問題”，这就說明了帝国主义者是如何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死为敌的。那些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同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用裁軍节省下来的經費“援助”不发达国家的人，也该从这里清醒一下头脑，抛掉他們的幻想吧。

最后，罗斯托又主張，“在一个核武器世界中”，“負有締造一个由懂得成长的訣窍的老国家組成的和平的世界大家庭的任务。”⑤这完全是重彈前任美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欺騙人民的宣傳口号，所謂：“我們一定 将成为一个由 开放的社会組成的 世界大家庭。”⑥这里，罗斯托所說的“懂得成长的訣窍的老国家”，同艾森豪威尔所說的“开放的社会”一样，当然不是指的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則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指的帝国主义集团及其追隨者。罗斯托所宣揚的“和平的世界大家庭”也同艾森豪威尔所宣傳的“世界大家庭”一样，指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独霸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大家庭”。他們所謂的“和平”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个幌子吧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罗斯托非常喜爱战争，并竭力鼓吹战争。他在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时，問道：“人类能不能学会进行一种战争，这种战争的破坏力不大，刚好成为一种很好的消遣——并加速資本的折旧——而不致把地球毀掉？”⑦我們看，罗斯托竟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很好的消遣”，这簡直是灭絕人性的战争杀人犯的豺狼心腸。在罗斯托的心目中，只要“不把地球毀掉”，为了“加速資本的折旧”，为了垄断資本集团能掠取更多的利潤，任何战争都是必要的，都是解决經濟危机、解决生产过剩和开工不足的最好途徑。这种論調，也进一步为肯尼迪政府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鎮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論基础。无怪乎罗斯托“連升三級”，成为現任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的得力幫凶。

①、② 罗斯托：《經濟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譯本，第107頁。

③、④ 同上書，中譯本，第107頁。

⑤ 同上書，中譯本，第176頁。

⑥ 1958年8月13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同上書，中譯本，第149頁。

⑦ 同上書，中譯本，第105—106頁。

罗斯托的露骨的反动“理论”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伎俩，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遭到某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反对。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彼得·威尔斯说罗斯托的文章是“吹毛求疵的学院式的本能反应”，“不论阶级或意识形态均未引起他的注意。”<sup>①</sup>加拿大麦杰尔大学大卫·拉脱教授认为罗斯托的“成长阶段”的分析“没有任何科学可靠性或预测作用”；并说“罗斯托天真地着重技术，而不着重社会的事实真相，……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只能说是十分近视的和反动的。”<sup>②</sup>罗斯托妄想以“非共产主义者宣言”为号召，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证明资本主义永生，社会主义不存在，从而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这种企图，当然是“螳臂挡车”，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1963年3月)

① 彼得·威尔斯的文章，载英国《遭遇》杂志，1959年12月号。

② 大卫·拉脱的文章，载美国《生活》杂志，1960年4月11日。